

思 想 译 丛

# 时 尚 的 学 哲



齐奥尔格·西美尔/著

费勇 吴贻/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THOUGHT  
Translation Series

思想  
译丛

时尚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齐奥尔格·西美尔 著  
费勇 吴普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尚的哲学 / (德) 西美尔著; 费勇, 吴瞿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9

书名原文: The Philosophy of Fashion

ISBN 7-5039-2080-7

I. 时… II. ①西… ②费… III. 西美尔 - 后现代  
主义 - 文集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265 号

### 时尚的哲学

著 者 [德] 齐奥尔特·西美尔

译 者 费 勇 吴瞿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KING/QUEEN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mailto: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80-7/B·5

定 价 17.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思想译丛

主编：汪民安 陈永国

编委：陈永国 费 勇 马海良

苗 洪 汪民安

## 译者前言

### 一

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被认为是19、20世纪之交德国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与他的同时代理论家相比，他给人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但人们又不能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西美尔的魅力也许在于他把所谓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了一种写作，一种随着生命的细微感觉而涓涓流淌的叙述。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在西美尔的写作面前遇到挑战，社会学还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文化批评？抑或是文化哲学？等等，这是人们面对西美尔的文本时经常产生的疑惑。许多人更多地以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同时又往往强调他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学家。或者加上一句：但他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论述的。这是饶有意味的，当我们在现有学科疆界内无法找到容身之处时，或试图超越这些疆界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以“文化”这个词来打发一切。也许，对西美尔而言，一开始就没有去考量这是属于什么学科，即，没有为自己去限定一个学科的规则，他的出发点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存在中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学科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正如西美尔在谈论货币时所谈到的，人们停留在通向最终价值的桥上却忘掉了最终价值，用西美尔的

说法，这是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学科的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却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惟一的目的。人们对当代学术研究的状况多有不满，以为缺乏方法论或理论意识或严谨的实证，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并非理论或材料的匮乏，而是生命感觉的匮乏。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好像是陈寅恪曾说过，做学问应当有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学问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学问其实在大的层面上与艺术、宗教等一样，是给人以真与美。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学术是一种写作，惟其是写作，它才不受所谓研究对象的制约而自足地向人们敞开。学术在今天的沦落，似乎印证了西美尔隐约提到过的人类永恒的悲剧：总是栖居在手段的桥上而忘了我们最终要到达之处。在体制内——在学院或研究院或所谓作家协会诸如此类的东西内——的学者或所谓批评家，其实已经与政府机构内的公务员无异，他们的所谓论文其实也不比那些千篇一律的公文高明到哪儿去。在繁琐的体制运作中，学术离它的最初目的相距越来越远。西美尔式的学科之外的论述，在我们的时代愈发显出学术本来应有的扣人心弦的力量，或者说，它们让学术回到了原点或正在回到原点。

## 二

西美尔出生在柏林的市中心，一个类似纽约时代广场的地方，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来自中心的人，一辈子都在边缘上打转。这是一种不幸，但同时又恰恰是这种不幸，使得他免受体制的拘束，而以一个旁观者、局外人自由地思与写。他可以一直在观察，而不会陷入。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和谐，因此，从童年时代开始，边缘感与不安全感

就已经伴随着他。但对他真正造成伤害的，也许是他始终申请不到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西美尔高中毕业后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与哲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在日后成为德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历史学家 Mommsen、Treitschke、Syber、Droysen，哲学家 Harms、Zeller，艺术史学家 Hermann、Grimm，人类学家 Lazrus、Steinthal，以及心理学家 Bastinian 等。1881 年他以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在 1885 年，他在柏林大学担任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并不由学校支付工资，而是从学生的听课费中获取报酬。西美尔的讲课十分精彩，他广博的知识视野和独具个人风格的表述方式，以及绵绵不绝的新颖思想，吸引了许多学生，成为当时柏林精英文化界的一个文化事件。爱米·路德维格（Emil Ludwig）形容西美尔讲课时像一个完美的牙医那样仔细探察，用着最精细的探针深入到事物的空穴，最细心地抓住根源上的神经，然后把它们拉出来。尽管有教学上的巨大成功，但直到 1901 年，他仍然是个编外讲师。那时他已经出版了 6 本著作、70 多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还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同时，像韦伯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极力推举他，但他始终不能在柏林大学得到正式的教授职位。据说，这与他的学术无关，原因只在于他是个犹太人，这情形有点像西美尔自己在《陌生人》这篇文章中描述的，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就不论他的财产怎样变化，都要交相同的税。

差不多终其一生，西美尔都是学院的局外人，或陌生人，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受到经济的困扰，由于他的监护人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几乎不用工作就能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他在柏林的文化界是一个极其活跃的人物，除了社会学圈子外，他还与文化界的其他许多圈子有着广泛的交往，例如，著名诗人里尔克就是他的好友。他不属于任何圈子，但又属于任何圈子。他在各种知识领域的交汇点上自由来去。他在世的时候，像韦伯、胡

塞尔、哈耐克 (Adolf Von Harnack)、里可特 (Heinrich Rickert) 等大师级的理论家已经对他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总共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上发表了 200 多篇文章, 15 本涉及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著作, 其中影响最大的大约是那本介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货币哲学》, 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最完整的一本著作。西美尔的绝大部分论述都不合乎学院中的“学术规则”, 给人缺乏体系的感觉, 大约正因为此, 他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 都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不过, 这也许恰恰说明了他的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他抵达的是不可言说的最深处。他的论述很难归纳成一条一条的理论, 在课堂上作为某一学派向学生讲解。但是, 阅读者在他的字里行间, 永远能感受到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的启示, 他的文字是那种能够不断地激发起阅读者灵感的文字。虽然不是某学派的宗师, 而且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遭遇被遗忘的命运, 但实际上, 在欧洲思想界有很多人, 例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本雅明、卢卡契等, 都从西美尔的文字中得到过不少养料。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所谓文化批评的兴起, 人们对西美尔也愈来愈感到兴趣, 因为人们发现早在近一百年前, 西美尔已经对现在文化批评所关注的许多问题有过锐利的讨论, 而他的批评姿态即使在今天仍极具前卫性。

### 三

托尼斯 (F. Toennies) 读到西美尔的第一本书时曾说西美尔的书有着大都会的气息。确实, 西美尔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大都会中的日常现象, 而且是日常现象中的细节性元素, 例如货币、卖淫、娱乐等等。但是, 西美尔的论述姿态与大都会的精神完全不同。如果说大都会的精神在于官能的碎片式舞蹈, 一切都



在形色声中稍纵即逝，那么，西美尔恰恰以沉思的姿态凝视这些流动的场景，把喧闹背后的寂静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来。因而，他的生命感觉并非印象式的、散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底蕴。他对当前的日常现象或生活景象的把握，从感觉出发走上的是思想之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美尔在讨论问题时，很少局限于某个界域如都市、民族、阶级之类，他总是把问题还原成普遍的人类问题，在最本原的层面上加以论述。无论讨论什么，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这些现象或事物与人的存在，与人的最日常的存在有何关联。人们从西美尔的著述中看到了寂静主义、悲观主义，在我看来，都与他那种还原式的思路息息相关。当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最细微的问题，都被放置于终极的层面加以考量，或者说，当一个人能从所有的问题中感受到终极性，那么，他除了悲观以外，还能有什么？当然，这种悲观实际上是透彻之后的澄明，洋溢的是安详与静寂。正因为此，西美尔几乎对事物不作什么结论性的判断，他往往只是为我们指出理解一事物所可能的各种方向。

同时，西美尔讲究文体本身的美，他的论文往往具有小品文的质素。尽管他的表述常常显得晦涩，但读者仍能强烈地被他谈论的方式所吸引。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在他的叙述中，往往获得了令我们惊喜的光芒。在这一点上，学术的写作与文学的写作一样，有着“陌生化”的特质，只不过它们的形式与效果并不一样。文学写作则是将生活中清晰的东西转化成意象，将一切可说的变成不可说的，学术写作似乎将生活中混乱的表面的东西加以过滤，转换成清晰而深邃的思想，将一切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在此，所有的写作都不过是以“说”来进入“自我”与“世界”，犹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而言，“说”很可能是他们与现实发生关系的惟一途径，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是他们改变现实的惟一手

段。但学院知识分子面对现实中各种现象/事物的激荡，他的“说”可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全然的退避，退避到古典的遗产当中，例如埋头研究《诗经》、莎士比亚之类，这退避表面看与世无关，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现实不屑一顾的姿态；另一种是西美尔式的，试图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借这种理解来超越现实。前者是安全的、稳健的，但容易流于无聊，后者是危险的、创造性的，虽然往往会被怀疑是否具有学术性，却常常有开拓的气象，但是，也容易鱼龙混杂，难以判断。对于前者而言，需要的是当代氛围的无形渗透，对于后者而言，需要的是历史基础如房子的地基那样隐于不可见的深处。从这一点而言，西美尔对于今天中国的学院知识分子，也许不乏启发之处。

#### 四

本书中的论文选自 David Frisby 和 Mike Featherstone 编的《*Simmel On Culture*》、Kurt Wolff 编的《*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Guy Oakes 编的《*Georg Simmel: On Women, Sexuality and Love*》。吴贻译了《宗教社会学》、《当代文化中的货币》、《忧郁的栖居者》、《妇女代表大会与社会民主》、《对当下与未来的卖淫活动的一些评论》、《柏林贸易展》、《关于招魂术的一点看法》、《感觉社会学》、《交际社会学》、《饮食社会学》、《现代文化的矛盾》、《文化的危机》，其余由费勇译出，最后由费勇对全书作了统校。李耿晖、陆杰曾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汪民安先生在此书的翻译与出版过程中给予了不少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西美尔的文字本身相当难译，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又是从英语转译，错漏之处肯定不少，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目 录

译者前言	(1)
感觉社会学	(1)
交际社会学	(15)
饮食社会学	(29)
空间社会学 (节选)	(37)
宗教社会学	(51)
时尚的哲学	(70)
当代文化中的货币	(94)
陌生人	(110)
忧郁的栖居者	(116)
妇女代表大会与社会民主	(121)
对当下与未来的卖淫活动的一些评论	(127)
柏林贸易展	(138)
关于招魂术的一点看法	(143)
现代文化的矛盾	(152)
文化的危机	(171)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186)

# 感觉社会学

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是与以显微镜的使用为开端的有机生物科学相对应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研究被限定在有一定体积、彼此分离的器官上，而且它们的形状与功能上的区别都显而易见的话，那么从此以后，生命过程开始向我们展现它与其最细微的部分——细胞之间的联系，以及细胞之间难以计数、永无止息的相互作用又是如何构成了这种生命的进程。只有了解了它们究竟是怎样的相互连接或者彼此破坏，又是如何相互同化或互施化学影响，我们才能逐渐地明了身体发展，保持、改变自身形式的方式。在一些诸如心、肺、胃、肾、大脑和运动器官等主要器官里，这些生命的基本元素与它们的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形成直接可见的特殊结构与功能。那些发生在生命最细小的元素之间难以计数的事件，实际上只有依靠生命中可见的成分才能组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件当成生命真正的基础的话，那么仅仅依靠对那些主要器官的研究是无法使我们理解生命的互相关联的。

现在的社会科学亦大体上处于这种阶段：我们仅能考察非常庞大与清晰可见的社会结构，并尝试由此提取一种视角，从整体上去观照社会生活。国家与贸易联盟、教会与家庭形式、行会与工厂结构、阶级构成以及劳动的工业分工——这一切与相类似的主要组织和系统形成了我们的社会，并填满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事实上，它们已经是一种较高级的结构形式。许多例子都说明，在它们内部或对它们而言，社会化个体的真实、具体的生活已经是固定了的。除了被提升到与那些综合组织同一层次的联系形式之外，把人类绾结在一起的律动着的生活还呈现出数量众多的其他形式。这些形式尽管总是处于变化不定，难以把握的状态之中，但个体却是通过它们才与社会存在互相联系。

人们相互观照，同时嫉羨着对方；他们彼此尺素传书寄托思念，共进晚餐加深交流；他们对事物有着非功利的同情或憎恶；当他们迷茫时，会向他人求助；当他们为了取悦某人时，会用亮丽的服饰装扮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论是稍纵即逝，还是持续很久；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发生；也许是微不足道，也许是非同寻常。以上这些例子是从人与人之间成千上万种关系中随意选取的，正是它们把人们持续连结在一起。每一天、每一秒，这些纽带被编结，被舍弃，又被重新拾起，旧的纽带被新的所取代，或是与新的相互交织。在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原子间的互动，这种只有通过心理的显微镜才能观测得到的互动，支撑着这个真实却又令人迷惑的社会全部的韧性与弹性，多样性与一致性。就我们的经验来看，社会的真实生活肯定不是由那些组成社会科学领域传统内容的客观结构构建起来的。它会分裂成一系列各异的系统，这就好比一个人体内只有形状各异，能被迅速辨认出来的器官，却没有那些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得到的细致繁复的细胞活动。

无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普遍存在这样的构想：实际发展的真正动因是繁复多样的影响力之汇总。这个位置原先属于那些灾难性的社会动荡和无所不包的一致力量，因为它们能够决定社会的整体情况与变迁，但现在这些细小得个体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力已经取而代之。下文要涉及到的研究调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构想，即在社会学领域里，也应相应地更加确切

与深刻地关注研究对象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仅仅着眼于那些大型的、绝对超个人的整体结构。感官的相互感知与影响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共存、合作与对立究竟有什么意义，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我们之所以可以进行人际互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引发了感官效应。既然这是不证自明的不争事实，那么进一步更细致的观察就能够说明，这些人际之间互相传递的感官印象所扮演的角色决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共同基础和前提。每一种感官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它们合力构建了个体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在感官印象的细微差别中也有相应体现；在个体交往中，一种感官获得的印象往往压倒一切，从而使这种交往产生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细小差别，而这种差别如果没有这种感官印象先行的话，是不会产生的。

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感觉来认识他人，这引发出两种不同的趋势。由于我们过多地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感受，因此一个人的表情、语调，甚至身体姿势，往往造成了我们对这个人的喜恶，以及我们自身的兴奋、抑郁、激动或是冷静。所有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他人的承认、评断，而是全然自我的。我看到他或她在那里，继而产生好感或恶感，这种感受只有我一人体验得到。更确切地说，这种对人的感官存在的反应将他人隔绝在自我之外。

感官印象的发展一旦成为我们了解他者的手段，就拓展了另一个趋势：对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仅仅是一座桥梁，我可以通过它将对方变成我认知的对象。讲话的声音与其含义可能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会直接使我们感到喜欢或厌倦，这与他说话的内容无关；另一方面，一个人所说的话帮助我们了解他此刻的思想，又感知他的精神状况。所有的感官印象或许都具有类似的特质：它们既作为主体的情绪与情感，将我们带入主体世界；又作为关于客体的知识把我们引向客体。对非人类的客

体而言，这两方面无疑是相分离的。在这类客体面前，我们可以强调它们的主观情感价值：比如我们感受到玫瑰的芬芳，一种声响的可爱，还有风中枝条的轻轻摇曳，并把这些当成自己精神内部升腾起的一种喜乐。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一朵玫瑰，一种声音或是一株树木，为此我们所倾注的精力与前者不同，而且往往不经意地与前者相悖。而如果谈到人，那么这二者就会或多或少脱离具体情境，同时改变、交织成一个整体。我们对他人的感官印象，一方面引发了他们的情感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感官印象还使主体对对象本能的认识，在实际应用中，形成我们与那个人关系基础之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两种因素——一种噪音的声响与说话的内容，容貌与对它所作的心理诠释，个体气质令人喜爱或是令人生厌，人们由以上这些本能地推论出这个人的精神特质，有时还能推论出此人所属的文化层面——这两种感官印象的发展，依赖于我们与对象的关系。这种依赖的程度很不相同，而且二者的混合情况亦不相同。

在人类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注视或许是最直接最纯粹的一种互动方式。社会纽带在其他地方编织的网络往往具有客观的内容，或者会产生客观的形式。甚至我们的所听所说也具有客观的含义，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这种含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传递。然而，相互交错的视线将双方绾结在一起，这最生气勃勃的互动，并没有被固定于任何客观结构之中；双方借由互相注视而建立的一致性在事件与官能之中保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此种联系是如此微妙与紧密，以至于它只存在于眼神间最直接的交流之中，任何一点偏差，哪怕是视线偶尔的偏离，都会将其独特性破坏殆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视线的互动没有给任何客观性留下空间：在感官功能出现错误的那个瞬间，互动便完全停止。而在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中，

客观性会直接或间接地保有一席之地。与简单的看到或是细致观察某人相比，互相注视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且无与伦比的关系。假如这种注视不存在，人际间的种种感觉诸如同情与厌恶、亲密与淡漠都会被完全改变。

射向他人的视线与对他人的观感本身是具表达性的，他人注视别人的眼光也具有相同的性质。这值得注意的事实正证明了此种互动关系的亲密程度。正如人类主体试图去认知客体，最后不得不向客体屈服；当一个人通过注视把他人引入自身时，他也在展现自己。在视线的交流中，没有人只获得而不付出。眼神总是向他人泄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自我灵魂。很明显，只有在双方互相注视时这种交流才会存在，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注视无疑成就了人类关系域中最完满的互惠关系。由此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羞耻总是使人们望着地面来避免他人的目光。显然，这不仅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保护自己不陷入尴尬的境地。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降低视角可以避免他人探测到自己。因为注视他人不光使我们认识别人，同时也会让他人认识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个性、情绪与冲动会沿着连接两双眼睛的视线传递给对方。通常所说的“鸵鸟战略”在这里是切实可行的：任何个体假使不注视他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对方发现。除非当他人看到自己时，自己也回视对方，否则人类决不会在他人面前完全坦露自身。

然而，眼睛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首先依赖于面部表情的含义，因为当两个人互相注视时，脸是目光投射的首要对象。人们很少充分意识到，即便是联系中最实际的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双方互相认知——这并不仅仅指所有外部的东西，或者是他人瞬间的意图与情绪。而我们对于他人有意识的或直觉的了解，对他们内在本质的认识，都难以避免地会对我们与他们之间或短暂或长久的关系造成影响。



然而，脸部是所有这些认知集结平衡的中心。它是个体所拥有的生活条件的标志。过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永远地刻在每个人的脸上，不可磨灭。我们既然能够如此仔细地看出人脸的特征，那么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这样去做，它都为人际关系带来了某种超实际的因素：人们总是习惯于首先从一个人的外表，而非行动，来建立对他的初步印象。脸使人们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因此，作为表情的载体，脸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虽然，它不会像手、脚或是整个躯体那样行动，它也不支持人们的心理或实践行为，但它的存在却向他人透露了这些行为。

“认知”这种具有特殊社会学意义的类型以眼睛为媒介，又以脸为决定性因素；因为在人与人的相互注视中，脸首先被注意到。“知”与“认知”仍有所不同。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决定了我们对他人的了解。之所以大家通常不注意这一点，是因为，一旦我们有了对他人的初次印象后，便立即关注于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以此来决定我们的具体反应。不过，如果我们尝试去有意识的了解它，那么我们会惊讶于第一印象究竟提供了多少关于他人的信息。当然，我们不能立即说他是聪明还是愚蠢，热心还是阴险，敏感还是麻木。我们很容易将许多人共同拥有的一般性格特质分派给这些常识性的词汇。但是对他人的初次印象却并非这些概念性东西所能囊括——尽管它们通常对之后的认识起到关键性作用——应该说，它是对一个个体通过外表，首先是他的脸，所透露出的个性的一种瞬间把握。所以初次印象经常带有错误和偏颇的成分，但大体上都可以被忽略。

正是由于脸的存在，个体的内在本质以及已经永久性化为其中的一部分的私人经验都转化成了完全可见的符号；并且个体随着景况不同，表情也可以随时改变。瞬间的情绪、冲动，使人的面部表情产生特殊的细微差异，它们通常体现出个体总体上的